



体育史观的重构与研究范式的转变

——兼论体育的源起与概念演进

Reconstructing Views of Sports History and Transforming Research Paradigms: A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Historiography.

郝勤

HAO Qin

摘要:本文就传统体育史观进行了回顾与讨论,并对开展体育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体育的概念、定义等问题进行了再思考与探讨。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代体育发展特点与新史学理论,提出了新的体育史观与研究范式。

关键词:体育史观;体育概念;研究范式;概念;新史学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18)03-0007-07

1 传播论与进化论:两种传统体育史观回顾

历史学作为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当然也是体育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基础。在国际体育史学领域,中国是较早形成自己体育史话语的国家。1919年,郭希汾撰著了中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1]1926年郝更生用英文出版了《中国体育概论》,^[2]其第一章即为“中国体育之历史”。这两本著作开创了中国的体育史学和体育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20世纪60年代,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成立为标志,中国的体育史学已然成为中国体育科学体系中最早的独立学科之一。

史观是史学家对社会历史认知与评判的价值体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往往也代表了一定社会阶级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知评判立场与观点。体育史观(以下简称体史观)是体育史家对体育发生、演进、传播、变迁的历史认知体系及对重大体育事件、人物、活动等进行评判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体史观会对体育的历史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并对体

育史研究和体育史学发展,甚至对整个体育学科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西方的神学与哲学。从孔子削笔作《春秋》始,中国传统史学的功能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纪录,而是要建构以儒家伦理学说为核心的忠奸、正邪、善恶、是非、褒贬的价值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进入中国,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其影响较大的是兰克史观与唯物史观。兰克(Leopold von Ranke)是19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主张据事直书,利用史料客观地再现历史。唯物史观又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史观。唯物史观主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由此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主张以阶级的观点看待社会发展,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都是政治史与民族史范式,其关注点在于以国家、民族为边界的政治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军事等宏大叙事。在其影响下,中外传统体育史学亦按政治史范式和民族史话语来构造体育的叙事方式,由此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体史观流派。根据其特征,我们可将其称为传播体史观与进化体史观两大体史观。

传播体史观的特点是体育欧洲起源论,其主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体育文物调查与数据库建设”(15ZDB145)。

作者简介:郝勤,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史,E-mail:1193562224@qq.com。

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收稿日期:2018-01-20 **修回日期:**2018-04-05

观点是认为体育起源于古希腊,经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过渡,于18至19世纪形成德国体操与英国户外竞技两大体系,并于19下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国,成为现代体育的主流形态。传播体史观在理论上受到以德国学者F·格雷布纳、奥地利学者施密特和英国学者史密斯等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强调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文化传播原理解释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在这一史观下,西方体育史学者建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体育传播史叙事,其主要代表有20世纪70年代D·B·范达冷《世界体育史》、^[3]哈·肯·史密斯《西洋体育史》、^[4]日本学者岸野雄三《体育史学》、^[5]匈牙利学者拉斯洛·孔《体育运动全史》^[6]等。

传播体史观以西方近代出现的“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与竞技运动(Sports或Athletics)为框架尺度来划定“体育”的内涵与边界,将世界体育解读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体育传播史。传播体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18世纪以来欧洲体育在全世界传播事实:“一个国家接受和引进现代体育的能力本身就是该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指数。”^[7]但是,由于这一观点将“体育”限定于欧洲的历史叙事,因而既无法全面客观地描述体育的历史,也无法解释世界体育的多元性这一客观事实。

进化体史观则主张体育的普世性与多元性。其根据是认为“体育”就是以健康和娱乐为目的的身体活动。在此定义下,体育的起源并非欧洲的专利,而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与地区都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形态与历史文化遗产。这也就是现今“民族传统体育”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逻辑起点与概念依据。进化体史观否认传播体史观的核心体育欧洲起源论,认为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独立的体育文化创造与发明的能力,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生态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而已。进化体史观现今得到越来越多体育史家的认同。诚如德国历史学者沃尔夫冈·贝林格指出:“运动是一个人类学常数,它在不同文化中有着各自不同的体现,其发展受到不断变化的自然、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8]

在中国,进化体史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与话语逻辑。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定的历史背景,早期的中国体育史学者都几乎本能地反感和抵制体育欧洲起源论,并自觉地返回悠久古老的本土文明中去寻找建构本民族的体育史叙事。中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是《中国体育史》而不是“西洋体育史”,这一现象是不寻常的。该书作者郭希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18)

创始人之一。尽管该校的办学宗旨与教学内容都来自于从日本引入的西方“体操”体系,体育史课程内容理当讲授西方体育史,但郭希汾却自行编撰了中国首部《中国体育史》,别开生面地梳理出中国本土的传统体育史源流。同样的例子是郝更生用英文撰著的《体育概论》。郝氏本就读于美国著名的春田学院,接受的是全面的西方体育教育,但其于1926年在美国撰写的《体育概论》首章却是《中国体育之历史》,表达了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下对体育的独特理解与诠释。踵接其后的则有唐豪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史参考资料》(1957),李季芳主编的《中国古代体育史》(1986)等。在进化体史观指导下,中国的体育史学一方面以西方体育概念来建构其叙事方式(如早期曾有“中国古代田径运动”“中国古代球类运动”等提法),另一方面,体育又被解读为以近现代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民族文化演进叙事。而其背后,则暗喻两个话语逻辑:其一是否认现代体育的欧洲起源论与西方中心传播论;其二则是抵制19世纪以来由西方主导的跨国性体育组织、国际赛事与主流运动项目所构成的欧美体育文化霸权话语。

综上所述,传播体史观和进化体史观都分别依据各自的话语文本来建构自己的体育史叙事,虽然两者都不乏其根据,但亦表现出各自话语方式的偏颇与研究范式的缺陷。前者如一些中国学者或纠缠于体育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与竞技运动(Sport)的概念和关系之争,或机械地从近现代体育概念中得出“中国古代无体育”的结论。后者则往往在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下,提出用本土的“国粹体育”来取带和抵制“西方洋体育”,导致了20世纪初的“土洋体育之争”和“国粹体育之争”,并在今天仍有一定影响。

2 形态与价值:体育史视域下的体育概念再思考

无论是传播体史观,还是进化体史观,其实问题的核心都集中在一个逻辑原点:究竟什么是体育?

概念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概念是由内涵与外延构成的人类认知体系基本单位。定义则是对概念的内涵或语词的意义所做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关于“体育”的概念与定义在中国是一个历史公案。由于现代体育的外传性,中文的“体育”“运动”“竞技”“比赛”等词汇又都源自于日语,导致国内体育理论界曾长期就“何谓体育”“体育与竞技的关系”等进行论争。笔者在此并不打算深涉这一论争。但因讨论体史观问题无法绕过“何谓体

育”这一逻辑起点,故而有必要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何谓体育”这一公案,笔者认为,与其中中国学者自说自话争论不休,不如与世俱进,与国际社会共享通用的术语用词。目前在国际社会,英语“Sport”一词作为总概念广泛使用。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权威文件《国际体育运动宪章》(1978)、欧盟委员会的《欧盟体育白皮书》(2007)、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2000)等,均使用“Sport”一词作为总概念来指代所有类型的体育。《欧盟体育白皮书》并就“Sport”一词专门作了解释:“Sport”系指“无论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旨在改善体能、促进心智健康、融洽社会关系或在各级竞赛中夺标的所有形式的身体活动。”^[9]

上述国际权威组织的正式文件用语反映了在当代国际话语体系中,“Sport”是相当于中文“体育”的总概念,其外延不仅指竞技运动,且覆盖包括体育教育、身体训练、运动竞技、大众健身等在内的所有体育形态。按照欧盟体育白皮书的定义,体育是“身体活动”与“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体育必须是“身体参与”或“付出体力”的,这就界定了体育与智力活动的属性区别;另一方面,并非所有“身体活动”都是体育。只有“旨在改善体能或促进心智健康的,融洽社会关系或在各级竞赛中夺标的体力活动”才是体育,这也就界定了体育与同样须付出体力的劳动、军事、艺术等活动的边界。

从体育史角度看,“体育”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概念。古代体育自不用说,仅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体育相对20世纪上半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代体育的功能价值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认知的“增强体质”。体育在增进人的意志、培养社会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现代人的娱乐与感情需求、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交往与国际交流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越来越为世人所公认。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体育概念主要还是个人为了健康娱乐而身体力行地参与某项运动,到20世纪下半叶体育则发展成为包括规模巨大的产业门类、席卷全球的球迷现象、形态丰富的衍生性文化产品(如体育新闻、体育赛事转播、体育艺术与表演、体育影视、体育博物馆等),甚至很多休闲旅游活动以及棋牌、电子竞技^[10]等也被列入体育之列。在此情况下,仅用“身体活动”作为根本属性已不能反映和定义当代体育的丰富内涵。从体育的形态特征与价值取向出发,笔者认为,体育是人身心同步参与的,以满足人的健身、情感、娱乐、社会归属等多元需求,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外交等诸多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的身体活动、情感活动与竞技比赛。

在体育这一总概念之下,根据需要—满足这一功能主义原则,可将体育划分为大众体育、竞技体育(精英体育与体育表演)、体育教育和体育文化等下属概念。

从“形态+价值”的定义出发,体育史学反向追溯的体育之源就是人类的两种社会行为:游戏与身体训练。前者是出于玩耍、娱乐、休闲、社交等动机的个体或有组织的身体活动;后者则是基于国家的政治、军事、教育、国民体质等需求的,通过立法、法规、政策、纪律等体现的有组织的身体的活动。

游戏作为体育之源是基于人的玩耍本能与天性。玩耍是身体参与的、自然的、无功利、无规则的娱乐行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史前文化发展和原始信仰的产生,人类从生物性的玩耍中演化出游戏和仪式。赫伊津哈认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并伴有紧张愉悦的快感。”^[11]游戏与玩耍的本质区别是规则。无论是有组织的游戏还是自发性的游戏,游戏的参与者必须遵守事先约定的规则来玩耍。从这个意义上看,游戏就是在规则下玩耍。

仪式是史前人类最重要的社会行为之一,其功能能是赋予事物或人的行为以神圣意义,以强化人的族群意识与归属感。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是人们运用技术程序,来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力量的信仰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2]仪式是史前游戏的神圣化与神秘化。美国人类学者在考查印第安人的娱乐项目后指出:“通常,游戏是以仪式的形式出现,用来取悦神灵,祈求土地多产,天降甘雨、赐予和延长生命、驱除恶魔、或是治愈疾病。”^[7]爱德华·伯勒尔·泰勒所著《原始文化》、詹·乔·弗雷泽的《金枝》、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斯图尔特·库林《北美印第安人的游戏》等都记录了大量史前社会的仪式化表演与竞赛活动。

竞技运动是游戏的高级形式。从仪式的神圣性、规则性、符号性、程序性、编码性、操作性与狂欢性而言,竞技运动就是高度仪式化的游戏。古希腊四大运动会都是祭礼仪式,而现代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升旗仪式、火炬传递仪式、运动员裁判员宣誓仪式、颁奖仪式等都源于古奥运会仪式。在古代中国,诸如射礼、龙舟、舞龙舞狮、导引吐纳等也都是仪式化的活动。所以卡尔·迪姆认为:“所有的身体运动一开始都是带有祭礼性质的”。^[7]

竞技运动来源于游戏的一种形态——通过有

身体参与的比赛来决定胜负,即竞赛游戏。但竞技运动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操作系统和制度体系。竞赛游戏一般是游戏者自发的和临时性规约,而竞技运动则是出于保证比赛公平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制度体系和操作体系,其要素包括竞赛组织、章程与规则、裁判与仲裁体系、运动者身份识别、标准化场地器材设备及服装、优胜者的奖励制度以及体育道德体系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成熟的竞技运动只能是一定阶级和国家的产物。竞技运动与游戏的另一区别是功利性。阿伦·古德曼认为:“游戏本身具有的目的性是体验源于过程的快乐,而非结果”。^[7]相对于游戏的这种随意性和非功利性,竞技运动则带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如荣誉、地位、奖励、物质性回报等。从体育史角度来看,虽然竞赛游戏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历史上只有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近代英国等极少数的民族和地区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竞技运动。究其缘由,则是因为由竞赛游戏发展成为竞技运动需要诸多特殊的人文要素和历史条件,而这些要素与要件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在某些历史阶段具备。

下面再来看体育的另一源头和基本形态——身体训练。阿伦·古特曼指出:“除了愉悦功能外,体育还是国家安全与经济生产力的因素。”^[7]人类有组织的身体训练是阶级、国家和战争的产物。军事当然并非体育。但军事训练却与体育关系极为密切,也是体育的源头之一。如果说,成熟的竞技运动在世界史上仅是个别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特例,则基于“戎”的体能训练和技能训练则是所有国家普适性的。

体育与军事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士兵的体能技能要求与训练上。由于战争对军队士兵作战素质有很高要求,国家必须有组织地对军队士兵开展严格的、系统的训练,包括针对士兵基本身体素质的体能训练和使用各类武器的技能训练,由此而形成军队的训练制度与体系。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和中国商周时期的贵族男性为了从事战争必须从小进行严格的体能技能训练,斯巴达就是其极端案例。古希腊竞技项目如跑步、标枪、铁饼、搏击、战车、摔跤等均是战争技能的仪式化、游戏化和竞技化。

中国古代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均高度重视军队士兵的体能训练与技能训练。如战国时期有齐国重视技能训练,魏国重视体能训练的说法:“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

田宅。”^[15]按这一要求,魏国士兵的考核标准是负重近百斤,一日奔跑百里尚有战力。这比今天的“铁人赛”难度还高,必须经过长期的和系统的训练才能达到。国家为了鼓励士兵训练达标,还制定了中试者免其赋税徭役、奖赏田地房宅的优厚奖励政策。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激励和诱惑下,魏国的士兵甚至民众对参加体能训练的热情很高,军队甚至民间已有系统的体能技能训练体系。

18至19世纪,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冲突背景下,历经德国的古茨姆斯、弗里德里希·扬、施皮司及瑞典的P·H·林等人的努力,军事化的“身体训练”被引入学校教育,逐渐形成了“身体教育”的概念与实践体系。至19世纪末,德、法、瑞典、丹麦等国为代表欧洲大陆系“身体教育”与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系户外竞技已然构成两大影响深远的体育体系。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重视“身体”与“意志”的培养,而后者则更强调“身心”与“情感”的满足。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游戏”与“身体训练”两大体育源头在近代欧洲大陆与英伦半岛这两个不同历史空间下的演进与定型。应指出的是,从一战到二战结束,随着英、美两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竞技运动依托现代奥运会和各类运动竞赛逐渐成为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世界体育主流。至20世纪70年代,“Sport”一词更成为世界通用的“体育”总概念。但在军队和一些国家的学校体育中,带强制性的“身体训练”仍然占有重要影响与地位。

中国的“体育”这一概念是近代甲午战争后才从日本传入的。岸野雄三曾详尽梳理日语中“体育”的来源与定义,指出日本在明治九年(1876年),开始将Physical Training译为“体育”,其后作为日译词固定下来,并逐渐为一般人使用。^[15]换言之,日本早期从西方引入的“体育”就是欧洲大陆系的“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而非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竞技(Sports)。这一点后来对中国体育发展影响深远。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先后接受日本传入的“军国民体育”体系和英美系的竞技体系。20世纪30年代后,英美竞技体系更成为中国体育实践的主流。但与此同时,在体育理论界,又深受德日“身体教育”理论影响,因而长期将体育的价值功能定位于“增强体质健康”与“为国增光”,从而对中国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所以要重新梳理体育的概念定义及源起,是因为只有厘清这一逻辑原点,我们才能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体育是人类历史上普遍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世界各个地区与民族都有自己的体育文

化。传播体史观和体育欧洲起源论是不成立的。而在此前提下,“民族传统体育”“中国古代体育”“中华传统体育”之类的概念才能成立。其二,虽然进化体史观反映了人类体育的多源性与多元性,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体育史上普遍存在的跨文化传播现象。运动项目的易传性与共享性是体育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传播与交流在世界体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三,厘清体育的本质属性与边界,同时承认体育的动态性与时代性特征,是现代体育理论与开展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一方面应避免用近代体育的概念来定义当代体育,从而窄化体育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也应当避免学术研究中体育概念的边界任意蔓延现象,将诸如端公跳神、巫婆作法、拜神磕长头、转经筒、走火炭、上刀山等都纳入“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范围,这样只会导致概念不清和逻辑混乱。

3 “参与史学”与“问题史学”:体史观的重构与范式转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体育与中国体育发生了剧烈变革。大众体育的兴起、体育产业的勃兴、球迷群体的出现、体育文化的发展都是20世纪上叶所难以想象的。随着职业体育和电视媒体的交互发展,体育的商业化大潮汹涌澎湃,在欧美国家产生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问题,如赛场上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服用兴奋剂、黑哨假球、行贿、赌球等。1986年发生的震撼世界的布鲁塞尔足球流氓事件使足球成为了暴力、流血和死亡的代名词,也迫使欧洲学术界开始从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关注体育问题。与此同时,西方政府与国际社会亦开始高度重视体育,出台了《欧盟体育白皮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体育运动宪章》等一系列权威文件。

就中国体育发展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体育的腾飞,中国特色的体育“举国体制”为中国竞技体育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保障,但也带来了诸多体制上和结构上难以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体育史学者提出从“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与“问题史学”,^[16]主张体育史学应当对体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从“参与”和“问题”的立场重新定位体育史的研究方向。在这一史观指导下,中国的体育史学界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依托其厚重的研究基础,征集了大量珍贵文物,创建了国内首个以中国古代体

育史为主题的博物馆,并在“跨界合作,多馆联办,依托赛事、参与互动”理念下,依托南京青奥会、第十三届全运会等大型综合性国内外赛事,联合国内多家主体博物馆先后发起举办了多届《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和“中华传统体育博览游艺会”,成功地将体育史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面向社会的公共产品,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好评。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与发展时期。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体育史学亦面临着新的任务与挑战,需要在体史观和研究范式上进行新的探索与思考:

其一,用“大体育观”重构体育史的时空谱系与叙事话语。所谓“大体育观”即从“身心活动”与“价值取向”这两大属性重新审视和反思“何谓体育”这一根本问题。现代体育是精神价值、社会价值与“体质”价值的统一。一方面,体育在形态上不只是“身体活动与竞技”,还包括经济产业、球迷现象和各种体育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体育的功能不仅是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还在满足人的心理、情感和社会归属等精神需求,培养人的精神、意志、道德、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大体育观反对身心二元论,反对割裂体育的身、心和社会价值,将体育功能窄化为“增强体质”“身体教育”或“休闲娱乐”的手段与工具;第三,大体育观将“体育”视为动态的和发展的,反对将“西方的”或“当今的”体育概念视为绝对的和不变的,主张根据体育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体育的概念与定义。

其二,以“大历史观”来指导体育史研究。所谓大历史观(亦称总体史或整体史)是20世纪新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新史学是指勃发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史学革新浪潮。其代表是法国年鉴学派的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新史学反对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传统,主张突破政治史藩篱,广泛融合吸收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法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历史学研究领域与视野拓展至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大历史观更强调“问题史学”导向,主张发挥史学家的主体性,重视历史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回应,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并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建立问题、假设、解释,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新史学和大历史观的启迪下,体育史研究应突破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式,不再将体育视为政治史的附庸,而应从世界、社会、

文化、项目、地域、生态、民族、族群、宗教、心理、习俗、艺术、建筑、服饰等各个领域与角度来研究体育的发生、演变、传播以及功能价值。

其三,从游戏与训练两大源头来阐释体育的概念与定义。传统体育理论研究或者将源自德国的“身体教育”作为体育的根本属性,或者将起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运动作为体育的主要形式,从而引发体育理论界长期的“PE与Sport之争”。而从体育史角度看,体育是“游戏本质”与“身体训练”的统一。一方面,体育是人类通过游戏和竞技等形式来满足和实现个人生理、情感到社会需要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体育又是国家和阶级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有组织的身體训练和教育活动。新体史观主张从“游戏起源”与“身体训练起源”的统一来阐释体育的普世性与多元性;同时亦承认体育具有强大的跨文化传播功能,现代体育是建构在西方体育的全球化传播与各民族传统体育的共存共享基础上的。

其四,受福柯后现代“问题史学”^[17]启迪,新体史观强调在不否定“寻根史学”前提下,主张体育史学者应着眼于当代体育发展现实、发现体育发展与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再经由史学逆行而上,探索其演变因果,寻求其规律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同时努力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具有应用价值的理论成果与社会公众服务产品。

除了史观的重构外,体育史学还需要思考研究范式的转变。范式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术共同体共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技术工具的集合,同时也是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的观念与行为方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观点,“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式。”^[18]传统体育史学研究范式主要表现为:(1)以进化论范式建构国别史为边界的古代体育史叙事谱系;(2)以传播论范式建构近现代体育史叙事谱系;(3)以政治史和编年史范式格式化体育史,如以朝代更替来划分体育史阶段,或以权力话语来构建体育史叙事。(4)重体系轻问题,重史料轻分析,重文献轻文物、档案、口述等。体史学应在以下方面探讨研究范式的转化:

其一,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当前无论世界体育与中国体育发展都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传统体育概念与定义与体育发展现实的错位与冲突;现代体育价值与功能的变化与重构;竞技体育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冲突;政府意志与体育社会化、商业化的冲突;体育教育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各国和地区体育发展不平衡性、竞技体育过度商业化、西方职业体育和媒介传

播的文化霸权主义、体育运动中的极端民族主义与各种歧视现象,奥运会的超大型化与高标准化、体育与国际政治等,这些都需要体育史学以自身的学科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来“逆寻”问题的历史因果与逻辑关联,从而提供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理论研究成果。

其二,以“社会”为场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体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体育史就是围绕人的游戏、竞技、身体训练等活动的社会关系史。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人不只是经由生物遗传,更主要的是由历史的传承而成其为人。”^[20]当代体育史学应关注诸如阶级与体育、国家与体育、民族与体育、体育与教育、体育与经济、大众体育与精英体育、女性与体育、体育人物、社会职业与体育、运动项目与社会阶层、职业运动与球迷群体、体育明星与社会大众、特殊人群与体育、体育与媒介传播、体育全球化与体育霸权主义等话题,在体育史研究中广泛引进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传播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文献、档案、调查、回忆、口述、影像、大数据、统计等方法综合运用。

其三,以“文化”为空间的研究。从广义而言,体育在本质上是人类文化形态之一。从狭义而言,体育除了以身体活动与竞技为核心外,还表现为以体育为主题的文化形态与产品,如体育观念与伦理、体育思想与理论、体育制度与法规、体育新闻与传播、体育影视、体育博物馆、体育艺术与表演、体育建筑、体育器材与服饰、体育广告等。因此,体育的历史不仅仅是事件与人物的编年史或记事史,而且应当是以“有目的的身心活动与竞技”为核心的文化史。其涉及的学科理论与方法除了体育学与历史学外,还包括哲学、美学、新闻学、传播学、影视学、艺术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等。

其四,以“项目”为载体的研究。作为一类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在任何时候都表现为人与具体活动形式及运动项目的关系。运动项目是竞技体育的载体。不从具体的活动形态及运动项目研究体育与体育史,学术研究就会空心化与虚构化。从体育史和社会学角度看,任何的运动项目背后都表现出社会、文化、经济、阶级、地域、国家、民族、信仰等重大意义。如马术运动、高尔夫、网球、现代五项等项目与足球、篮球、排球等运动背后就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又如足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球类项目,但在体育极

为发达的美国却没有地位。而橄榄球在美国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和地位,但在全世界却难以推广。再如中国的武术、日本的相扑、爱尔兰的盖尔足球等项目都凝聚着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体育的项目特性决定了无论是体育理论研究还是体育史研究都要慎谈“体育”。这也要求体育史学者应更加关注运动项目文化与运动项目史、赛事史、体育组织史等研究;关注运动项目与社会群体、社会伦理、社会心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职业、民族性格、民族文化传统、青少年教育、年龄与性别、地域地理等关系问题。

其五,以“世界”为对象的研究: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跨文化传播始终是体育史的基本特征之一。当代体育更是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种类。因此,简单封闭的国家体育史叙事难以完整反映当代体育的发展规律与特点。体育史学应从世界视野与全球跨文化传播的高度来构建体育文化传播叙事。其选题包括全球体育史、体育传播史、体育新闻史、媒介体育史、中外体育交流史等。这需要体育史学者广泛运用体育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传播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知识来构建体育史学科的全息图谱。

4 结语

体育史学已有百年历史。它在中国曾经兴盛过,也曾经落寞过。但作为体育科学和体育理论的基石性学科,它从未自弃,今后也决不会。借用法国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的话:此时此刻,史学应该有所坚持,拒绝自恋的倾向,切莫顾影自怜。在某些角落里,“历史之死”的呼喊虽然响彻云霄,但史学必须勇往直前,穿透魔镜去追寻新的世界,而非找寻已身的映照。历史依然巍然屹立!

参 考 文 献

- [1] 郭希汾. 中国体育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
- [2] 郝更生.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ina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 [3] D·B·范达冷. 世界体育史[M]. 张咏,译. 纽约:普林提斯-霍尔出版社,1971.
- [4] 哈·肯·史密斯. 西洋体育史[M]. 周特天,译.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3.
- [5] 岸野雄三. 体育科学[M]. 东京:日本大修馆书店,1983:7.
- [6] 拉斯洛·孔. 体育运动全史[M]. 颜绍泸,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6.
- [7] 阿伦·古特曼. 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 花勇民,译.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7.
- [8] 沃尔夫冈·贝林格. 运动通史[M]. 丁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 [9] EU White Paper on Sports[M]. 欧盟委员会,2007.
- [10] 历史上的今天 2003 年电竞既成了一项体育运动? [EB/OL]. http://www.sohu.com/a/205286996_99927734.
- [11] 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M]. 多人合译.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
- [12] 维克多·特纳. 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 赵玉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7-53.
- [1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1.
- [15] 岸野雄三. 体育史学[M]. 白澄生,等译,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编印,1982:24.
- [16] 郝勤.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体育史学:兼论体育史从“寻根史学”到“参与史学”的变革[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2):5-7.
- [17] 黄兴进.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M]. 上海:三联书店,2008:22.
- [18]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伍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合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0]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1:2-4.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sports history, and examines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sports –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sports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new views of sports history and research paradigm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sports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ography theory.

Key words: *view of sports history; concept of sports; research paradigm; concept; new history*

CLC number: G8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1-9154(2018)03-0007-07

(编辑 马杰华)